

案件編號: 762/2015

合議庭裁判書日期: 2015 年 9 月 17 日

主題:

《刑法典》第 56 條第 1 款

假釋要件

裁判書內容摘要

一、 澳門《刑法典》第 56 條第 1 款對假釋作出了規定。而是否給予假釋則取決於有關的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是否同時成立。

二、 假釋的形式要件指的是被判刑者服刑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服刑六個月；實質要件指的是，在綜合分析被判刑者的整體情況並考慮到犯罪的特別預防和一般預防的需要後，法院在被判刑者回歸社會和假釋對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的影響兩方面，均形成了有利於被判刑者的判斷。

三、 因此，當被判刑者具備了法律規定的形式要件時，並不一定能獲得假釋，還要看其是否也同時具備了實質要件。

四、 而不論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否肯定的判斷，也應對其人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寧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

裁判書製作人

陳廣勝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上訴案第 762/2015 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囚犯): A

上訴所針對的法院: 初級法院刑事起訴法庭

一、案情敘述

澳門初級法院刑事起訴法庭第二次審理囚犯 A 的假釋個案，最終以該囚犯並未符合澳門《刑法典》第 56 條第 1 款 a 和 b 項的規定為由，作出不准其假釋的裁決（詳見卷宗第 110 至第 112 頁的法官批示）。

囚犯不服，現透過辯護人向本中級法院提出上訴，力指其已完全符合《刑法典》第 56 條第 1 款的法定要求，故請求廢止該決定、批准其假釋（詳見卷宗第 128 至第 130 頁的上訴陳述書內容）。

駐刑事起訴法庭的檢察院司法官對上訴作出答覆，認為應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詳見卷宗第 132 頁至第 132 頁背面的上訴答覆狀內容）。

案件卷宗經移交予本中級法院後，駐本院的助理檢察長對之作出檢閱，亦提出上訴理由應被裁定為不成立的觀點（詳見卷宗第 142 頁至第 143 頁背面的意見書內容）。

隨後，裁判書製作人對卷宗作出初步審查，本合議庭的兩名助審法官亦相繼檢閱了卷宗。

現須對上訴作出裁決。

二、 上訴裁判的事實依據說明

本院透過審查案卷內的文件資料，得知下列有助斷案的情事：

上訴人因以正犯身份犯下一項販毒罪，而被處以六年零九個月徒刑。

上訴人已於去年 8 月 1 日服滿該刑期的三分之二，並於同日首次被否決假釋，其後於今年 2 月 5 日因犯獄規而於 6 月被罰，其最近一年的服刑表現被獄方評為「差」。

上訴人仍希望獲得假釋。

根據當年的犯毒罪既證案情，本身為內地居民的上訴人，卻在澳門被警方在其身上搜出淨重 7.364 和 10.436 公克的氯胺酮、淨重 3.288 和 0.348 公克的甲基苯丙胺，及淨重 2.664 公克的可卡因。此外，當時警方亦在上訴人在澳的住處尤其搜獲淨重 59.072、39.772 和 23.601 公克的氯

胺酮、淨重 8.387 和 2.828 公克的可卡因，以及淨重 3.840、2.752、7.86、16.124、0.812 和 0.192 公克的甲基苯丙胺。

三、 上訴裁判的法律依據說明

本院須首先指出，上訴庭除了須依職權審理的事項外，祇須解決上訴人在上訴狀的總結部份所具體提出和框劃的問題，而毋須分析上訴人在提出這些問題時所主張的每項理由（此一見解尤可見於本中級法院第 47/2002 號案 2002 年 7 月 25 日合議庭裁判書、第 63/2001 號案 2001 年 5 月 17 日合議庭裁判書、第 18/2001 號案 2001 年 5 月 3 日合議庭裁判書、第 130/2000 號案 2000 年 12 月 7 日合議庭裁判書，和第 1220 號案 2000 年 1 月 27 日合議庭裁判書內）。

如此，本案所要處理的上訴實質問題是：刑事起訴法庭的裁判有否違反澳門《刑法典》第 56 條第 1 款 a 項和 b 項的規定？

就這問題而言，本院得指出，上訴法院在檢測有關假釋的裁判的合法性時，祇屬在法律層面上查探該法庭有否準確適用《刑法典》第 56 條的有關規定。

為此，本院認為一如在過往多個同類案件中所作般，須先在此對假釋的制度作一個整體的介紹：

根據《刑法典》第 56 條第 1 款的規定，「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刑者假釋：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由此可見，是否給予假釋取決於上述形式要件及實質要件是否同時成立。

眾所周知，假釋的給予並不具自動性，也就是說，當被判刑者具備了法律規定的形式要件時，並不一定能獲得假釋，還要看其人是否也同時具備了實質要件。

假釋的形式要件指的是被判刑者服刑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服刑六個月；實質要件則指的是在綜合分析了被判刑者的整體情況並考慮到犯罪的特別預防和一般預防的需要後，法院在被判刑者回歸社會和假釋對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的影響兩方面均形成了有利於被判刑者的判斷。

而即使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寧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參閱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教授所著“**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葡萄牙刑法—犯罪的法律後果）一書，第 538 至 541 頁）。

在現行《刑法典》的修訂過程中，假釋制度也曾引起廣泛的討論，議員們都留意到在適用假釋制度時應更為嚴謹的問題，因為認為在之前的實踐中對法律要求的實質要件的審查方面並不是十分嚴謹，尤其是在一般預防的要求方面，或者說是社會對提前釋放被判刑者的接受方面（參閱 **MANUEL LEAL-HENRIQUE** 和 **MANUEL SIMAS SANTOS** 對

《澳門刑法典》所作的釋義(“CÓ DIGO PENAL DE MACAU”),第 154 頁)。

因此,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

在本個案中,上訴人毫無疑問確實具備了獲得假釋的形式要件。

然而,在《刑法典》第 56 條第 1 款 a 和 b 項所要求的兩項實質要件方面,則不能得出同樣的結論。

的確,從案卷中所載資料可知,上訴人自去年被否決假釋後,便犯了獄規,這已使本院不能相信他如今次獲假釋,便會洗心革面、不再犯事地去生活。

再者,上訴人當年以非本地居民身份犯下的販毒罪對本地社會治安的影響顯而易見,且其所涉及的毒品數量亦不少,本院不得不對其提前釋放對維護法律秩序方面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且可能對公眾對當日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造成的損害,加以衡量和考慮。如此,尤其考慮到上述罪行的一般預防要求,以及現在假釋上訴人可能引起的公眾心理承受程度,實不能認為現時提前釋放上訴人不會對本澳法律秩序造成負面影響。

總言之,上訴人並不符合《刑法典》第 56 條第 1 款 a 和 b 項所規定的給予假釋的實質條件,本院得維持今被上訴的司法決定。

四、 裁判

綜上所述，本合議庭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

上訴人須負擔上訴的訴訟費用，當中包括叁個訴訟費用計算單位的司法費和其辯護人應得的澳門幣壹仟捌佰元上訴服務費。

澳門，2015 年 9 月 17 日。

裁判書製作人
陳廣勝

第一助審法官
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蔡武彬